



尊嚴的四個層次 從紀實電影《本來面目》說起

張釗維

聖嚴法師紀錄片導演、CNEX 基金會製作總監

專長於「文化評論與紀錄片」等

壹、緣起

在開始進入這部電影之前，我應該要交代一下我個人的一些因緣背景。

首先是我跟法鼓山的因緣。近的因緣是 2002 那年我結婚，2003 年我母親突然去世，從那時候我比較密切地開始接觸佛法與禪法。2004 年我與同修（太太）說：「我們就近去找個地方皈依吧！」因為我心裡面總覺得要有一個師父才會踏實。當時我們住在關渡，而距離關渡最近的寺院當然就是「農禪寺」。於是，我們騎著摩托車到「農禪寺」皈依。我記得皈依的那一天是冬天，人很多，我們被排在很後面的地方，好像是在主會場之外的另一個鐵皮屋，看不見聖嚴法師（編按：後簡稱師父）本人，只能從電視螢幕上看到師父。

其實我們都不是非常認真的佛教徒，但會看一些師父的著作和經書，自己摸索著學習。我們大概是在 2006 年、2007 年的時候，因為工作的關係，舉家搬到北京去，春節時才會回到臺灣來。從那時候開始，每年回台，我就會帶著家人上法鼓山走走。記得第一次沿著「來迎觀音」，旁邊的小溪走到大殿去。不曉得為什麼我一面走一面掉淚，是一種非常深的觸動，一種內心被清洗的感覺。我們經常到「祈願觀音」殿求籤、大殿禮佛。我的老家與很多臺灣人的家庭一樣，每逢初一、十五要拜拜，然後會到廟裡面燒香，每年要祭祖等等。到廟裡面時，我的母親總是告訴我，反正你就求平安、求你的考試順利、求……等。同時因為我很晚婚，所以也要求趕緊找到一個老婆。諸如此類的各種祈求，所以剛開始到法鼓山拜佛的時候，我心裡面

也是各種的「求」。

記得大概是在 2010 年左右，有一天我又到法鼓山大殿。抬頭看到牌匾「本來面目」，我突然覺得，為什麼自己見到佛菩薩就一定要各種的「求」呢？我能不能只是來跟祂們打個招呼說：「佛菩薩你們好嗎？」然後告訴他們我很好，我來看你們……這樣就可以了，我是不是可以更輕鬆一點？從那時候開始，我的內心就放下了祈求的壓力與焦慮，更輕鬆了一點。這個經驗對我來講很關鍵。

第二個大的背景，是我在紀錄片的工作中，一直企圖去尋找一些根本問題的答案。最初是 2000 年，我跟幾個朋友做了一系列紀錄片《綠色矽島首部曲》，它是在談臺灣的資訊電子產業發展。我們訪問了大家耳熟能詳的宏碁、華碩、台積電、聯電等知名企業的高層人士。雖然我過去是念電機系的，但是我離開電機系以後跟同學們沒什麼聯繫，我聽說他們都當了電腦廠的高管，工作很辛苦但是很有成就感。一直到 2000 年做那一系列紀錄片的時候，我才重新回過頭去認識這個直至今日，依然是支撐臺灣整個社會的核心產業。我不知道各位曉不曉得，臺灣人做電腦是從盜版起家的，就是從盜版電動玩具到仿造 PC，這一路以來很少有原創。即便到了九〇年代臺灣的電腦產業已經發展得很好了，其實是有機會做一些原創產品，但那時候有人提出老二哲學，主張臺灣就是應該當老二。也許從很多客觀的國際環境條件來講，當老二的確看起來比較務實，合乎臺灣現實狀態。臺語有一句話叫「趴著、趴著卡味中槍」，頭要低著才不會被子彈打到，不要強出頭。這其實有一點反映出臺灣人的性格，但是我心裡還是有問號，為什麼我們不能當老大？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去尋找一個當老大的方式，或者是路

徑？為什麼我們不勇於追求原創？

到了 2007 年，我做了《財富之道》。從整個臺灣的代工產業開始，談到中國的世界工廠，以及整個中國東南沿海的貿易歷史。中國過去二、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很多的代工產業其實是從臺灣跟香港移過去的，帶動了中國的另一波代工產業。代工大概就是別人有一個原創的東西，我們幫忙打工，做其中的零部件或部分系統。例如做電腦外殼、螢幕、鍵盤和晶片等等，包括富士康也是幫蘋果做代工。

代工產業變成是整個華人崛起過程之中，很重要的一環。代工的這個意識，以及山寨、拷貝的這種意識，其實是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條路。但是，我們有沒有可能在經過這一條路之後，走向一條原創的路？這就是剛才我提到，那段時間一直縈繞在我心中的根本問題。

在做《財富之道》時，我突然意識到代工是一種比較現實、功利主義的思維，定位自己是老二去做代工就好了，模仿別人也沒有什麼好丟臉的。我不是在評論對錯，而是在思考這個思維是怎麼來的？我想到，這可能跟我小時候，民間社會求神拜佛的那一種心情是類似的。我們去求神拜佛的時候，無非就是要求功名、求賺錢、求多子多孫、求國泰民安，各種求，但是如果沒有得到所求，可能就會跟神佛翻臉。以前我見過，求六合彩明牌失利，把神像給丟到河裡面去的例子。這其實反映出我們對於信仰的一種態度，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從那時候我就開始思考我們有沒有（至少我自己），或能不能找到另外一種角度，或另外一個支點，重新回來看待、反思華人骨子裡這根深蒂固的現實主義精神。

後來，2014 年我在做抗戰空軍飛行員紀錄片《冲天》的同

時，也同時進行著另外一支紀錄片的前期調研（這個片子因為經費的關係後來沒有進行下去）。這個紀錄片是要拍一位印度瑜伽大師的生平，各位如果有學瑜伽，可能聽過艾揚格這位大師，他是印度瑜伽一個重要流派的創始人。2014 那一年我去印度兩三趟做調研，在艾揚格九十八歲過世之前有幸見到他，並採訪了他的幾位弟子，其中有一位五十餘歲的建築設計師，我問他的第一個問題是：「請問你為什麼要學瑜伽？」。

如果在我們所熟悉的西方或臺灣，問這個問題得到的回答大概就是：為了要健身、身材變好、身體健康、改善生活品質……等等，總之，是為了這一生的各種追求。但是艾揚格的這位弟子的回答完全把我給打倒了，他的回答是：「我練瑜伽是為了來世。」我才驚奇地發現原來印度人是這麼想的！原來「來世」的這個想法對於孟買中心區一位高社會階層的建築設計師而言，是可以如此自然地脫口而出！這令我非常驚訝。

那時候我就在想，雖然我們中國華人的信仰與印度的信仰有重疊的地方，甚至我們很多信仰是來自印度，但是事實上我們在某些地方，或有些東西「落鏈」了（編按：台語，脫節的意思）。脫離了信仰的原始初心，因此缺乏超越此生的思維意識，而停留在現世功利主義。我也開始思考，有沒有可能我們再相信有來世？我並不是在討論「來世」這個概念，而是想在一個現實的、求神拜佛的、求各種利益的這種信仰狀態之中，我們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在年輕的時候參與學生運動，很多朋友都是社會改革者、政治改革者。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我就在想臺灣這些社會、文化和政治的發展，到了二十一世紀遇到瓶頸時，其問題的根源究竟是什麼？我老實跟各位報告，我覺得那個問題點就

在於，我們對信仰這件事情的認識普遍不夠深刻，或者是不夠了解所謂正信的信仰到底是什麼吧！這個社會因為對生命與宇宙本源的正信與正道追尋不足，因此很容易陷入機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臨時抱佛腳的、只求現世回報的，甚至是山寨模仿的思考與行為模式。

相對於這樣的思考行為模式，我很慶幸近幾年來，我透過紀錄片在尋找答案的過程裡面，一路上法鼓山都在我的身邊。我並沒有去求它，但是在這個過程得到的內心支持與靈感，我覺得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我們每年都會到法鼓山充電。雖然我們其實沒有做什麼，甚至沒有參加什麼班（編按：法鼓山大教育課程）或者是聽講經，一直到去年我也才去打禪七。但是這些年點點滴滴的積累，到了 2017 年楊蓓老師代表「聖嚴教育基金會」找我來做師父的紀錄片的時候，我覺得對我來講就是一段很重要的因緣。讓我透過這個影片，試圖去回答我所關心的，我那時候稱之為「超越性的想像空間」這件事情，在華人的社會裡面是怎樣存在的？又怎樣才立得住？而我們作為一個世俗的人又要怎樣去看待這個超越性？

以上是對我個人近年來的追問與思考，做一個背景交代。

貳、《本來面目》創作的四個階段

一、敘事結構：十年為一個節點

接續剛剛談到的大背景，2017 年我們開始進行《本來面目》的創作。我先聲明，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所謂的創作者。

至少在做師父這個片子，以及做《冲天》的時候，我不太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創作者。我比較是一個 Messenger，就是一個轉達訊息的人。

其實在座的每一個人都在轉達訊息，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轉達訊息。有些人用論文、念經、布施、出坡的方式，而我也可以把做這個影片的兩年多將近三年，還有未來還會繼續進行的很多事情，看成是一個很長的出坡過程。而這每一個過程對我來講，都要去思考：什麼訊息需要被轉達。

2017 年的春天，我們製作團隊已經開始在看各種各樣的材料，包括師父的書籍、年譜、日記、影像記錄，甚至是師父的健康檢查報告。我們很早就確定了敘事結構是以十年為一個節點。各位在影片裡面大概已經看到了那個點：每逢西元年份尾數「9」的一年，對於師父來說都是一個特別的、有轉折關鍵意義的一年。我就圍繞著這個「9」，39、49、59、69、79、89、99、09 這幾年，來展開故事。影片所要傳達的訊息，就在這些節點裡面。

二、對這些節點的認識乃至詮釋：以 1979 年紐約街頭為例

可是，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些節點到底意味著什麼？69 年的時候師父去日本，59 年的時候師父開始要進入第二次的出家，49 年的時候從大陸到臺灣來，79 年的時候在美國紐約街頭流浪。這些點到底意味著什麼？

以紐約街頭流浪過程的這個點為例，就是這麼小的一個點，在師父生命的時間長度裡面佔的時間很短，也就那麼兩、三個月的時間。我記得是在《菩提樹》還是哪個雜誌上面看到，師父那時候寫信回臺灣，報告他在美國的狀況。基本上是說「我

是很歡喜的，雖然在風雪中行走，但是我心裡面是很歡喜。」我乍看到這一個材料的當下，心裡是有疑問的。師父真的很歡喜？他是不是要安慰在臺灣的師友們，才故意說他很歡喜？他心裡面是不是其實還有很多的糾結跟很多的不舒服？……這些想法一直在我心裡盤旋。

後來到了 2018 年的 2 月，過完春節的某一天。我剛睡醒，意識仍在朦朧中，那些世俗的東西還沒有開始在腦中運作的時候，我突然覺得「對啊，師父就是很歡喜啊！」。因為他把前半生那些糾結的因緣都已經放下，所以他走在風雪街頭上其實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狀態。他肯定是覺得輕鬆，就是要去擺開過去所有的這一些因緣，然後要開始做自己的那一種輕鬆和清爽吧！當然很歡喜！

這是到了 2018 年，也就是我們進行這個影片將近一年之後，我才開始對這些節點的意義有了初步的認識。產生這些認識之後，接著就會有一個工作必須完成。

三、宗教語言與俗世語言之間的相互轉換—導演與傳主之間的內在相應

這個工作對我來說是更大的挑戰：要在宗教的語言與俗世的語言之間相互轉換。因為我們一開始就設定這個影片是讓社會大眾看的，讓非法鼓山信眾、甚至是非佛教徒觀看。讓他們去理解曾經有這麼樣的一位法師，他做了這些事情。透過這位法師，他會認識到佛教的一些東西和法鼓山在做些什麼。而面對一般觀眾，我就得處理一個關於“翻譯”的問題。

比方說我們在談歡喜這件事情的時候，我知道在佛教的語

言，歡喜其實是有一個特定的語意。但是我們要跟一般的觀眾溝通的時候，我應該要用什麼樣的觀念、概念、甚至語詞來說？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我在影片的旁白解說詞裡面，非常少使用到佛教，甚至非常少使用宗教這個詞。我多半說的是他的信仰、或者是信仰，也就是希望能夠盡量的在觀念和語境上，能夠更向一般的觀眾打開。

四、以影音手法進行實現

但是在核心的概念上我要怎麼呈現？我是不是直接就使用師父，或佛教的語言在影片裡面呈現？這很可能會造成對觀眾的某一種隔閡，可是如果我要去翻譯這個東西，我憑什麼去翻譯它呢？今天我作為一個 messenger，我要怎麼翻譯師父的核心追求給大眾知曉呢？

我的做法是回到師父的一生，去感受那些過程跟我內心最相應的部分是什麼，然後用它來串起整個影片。而要找到這個相應之處，又是另外半年的時間。

2018年的9月，同樣是某一天清晨我剛睡醒，頭腦裡那一些糾結的思緒還沒有開始運作時，我突然意識到其實就是這幾個字：「尊嚴與純真」。當下我馬上就把這個思路寫下來寄給楊蓓老師。有了這個相應與體悟，才有了“翻譯”的依據，影片的整個重心才出現，那一些零散的訊息才會一一歸位。

參、為什麼是尊嚴？

一、社會文化背景

為什麼是尊嚴。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說，很簡單，就是我所生長的地方，臺灣，是一個從上到下不斷在尋找尊嚴甚至害怕失去尊嚴的社會。或者可以說，近代以來整個華人社會都在為尊嚴而焦慮。

我想不需要多說，大家大概都有體會。特別是歷經過去二、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人們吃飽飯之後，開始想著把尊嚴安置在哪裡。安置在學歷上面？在名利、形象上面？在國家民族的地位上面？在所謂的普世價值上面？我們有沒有跟得上最新最主流的世界動向，好像是衡量我們有沒有尊嚴的一個重要的指標。

在這過程裡面，我自己的尊嚴追求是來自於我把自己看成是一個知識分子。雖然我並不是在學院裡面鑽研學問，但是我認為自己其實是非常、非常關心知識分子的尊嚴這件事情。說白了就是，知識分子在這個社會到底還有沒有尊嚴？

我記得八〇年代末解嚴之後到九〇年代，整個臺灣社會在劇烈轉型的過程。我身邊好多朋友其實對於知識分子的這個稱謂是很鄙視的，就是覺得他們太精英、太高高在上、完全沒有跟人民站在一起諸如此類的，根本就是舊時代的產物。可是在我心裡始終覺得「知識分子」，應該不是我的那些朋友們所鄙視甚至詆毀的那個樣子。我認為在每一個時代應該有知識分子自己安身立命的方式，甚至自己的尊嚴所在，但是我這樣的想法是蠻邊緣的，這使我感受到壓抑與很大的危機。因為，如果我身為一個知識分子，在這個社會裡沒有辦法被認可。沒有辦法得到一種關於知識、思想和文化，如何對社會有用這件事情

的一個基本的尊重，那我們這個社會要怎麼辦呢？下一代要怎麼辦呢？我要怎麼辦呢？這就是我的尊嚴危機。

二、我的追尋與期盼

另外，就個人而言，我是家中老么，從小講話老是被我哥哥、姐姐打斷的那一種老么。我大學念電機系，後來不從事高科技卻跑去做紀錄片導演，讓我的家人很擔心。因為讀電機擁有工作上的鐵飯碗，況且家人們根本也搞不清楚紀錄片是什麼，既定的觀念是：拍紀錄片能夠賺錢養家嗎？能夠有社會的地位嗎？而我又自認為是一個非學院派的知識分子，我不可能也從沒有從學院中得到任何榮譽或所謂的位置。我們這個社會對於某某大學某某教授這種頭銜，聽起來就是跟某某先生、小姐不太一樣，這是很普遍的現象。

我一方面期盼著一種平等與純樸的人際關係及社會關係，一方面又處在一種壓抑與焦慮的境地中，並認為眼前的現象問題重重。我思考著該如何去跟臺灣所謂主流思想溝通？我怎麼樣去跟他們說其實事情不是這樣的，可以有其他的角度？

我始終認為，如果要從現在的民主 1.0 要爬升到民主 2.0，最根本的問題並不是我們的政治體制或憲法，而是我們的信仰出了問題。如果我們要從民主 1.0 到民主 2.0 的話，我們勢必要歷經一個心靈改革，甚至要有一個信仰改革才有可能。要有根植於華人歷史文化的、自己的宗教改革，而不是簡單地跟隨西方的腳步，乃至用西方的靈魂來替換自己的靈魂；這是我的看法。可是，我怎麼樣跟我那一些從西方回來的、學了那麼多社會科學跟政治科學的朋友們說呢？在他們腦袋裡面，宗教改革

這件事情是文藝復興時代以前的事情，不是現在進行式或未來進行式。因此不會出現在社會科學教科書裡，那麼我怎麼跟他們溝通呢？十幾年來，我經常覺得自己一肚子不合時宜，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越追求尊嚴越焦慮。

這就是為什麼在 2018 年 9 月的那個凌晨，我剛睡醒之際，「尊嚴」這個字眼會從腦海深處浮現的背景原因；然後我覺得我可以用這個詞去翻譯聖嚴法師的經歷，以及讓他的宗教語言跟世俗語言之間有一個轉換的可能性。

三、法鼓全集當中的「尊嚴」

既然我要用尊嚴這個概念來做轉換，於是我就做了一些工作，比方說我從《法鼓全集》裡面去搜「尊嚴」。我覺得《法鼓全集》實在太好了，可以全文檢索，非常方便。我找到了 106 個關於「尊嚴」的條目。其他的詞比方說「放下」是 866 個、「安心」是 513 個、「心安」是 276 個、「尊重」是 505 個、「人性」是 190 個、「自在」是 1306 個。在這些詞裡頭，有些詞師父會用的很多，「尊嚴」反而不是他用的很多的一個詞。事實上在他的語句裡頭，或者是我在看他的一生，對我來講最觸動我的就是他在面對那尊嚴的危機或者挑戰的時候，他的反應是什麼。

肆、尊嚴的四個層次

一、聖嚴法師的人生切片

回到師父的一生，從他的生命歷程裡面我看到了幾個重要的階段，就是我所說的尊嚴的四個層次。

（一）信仰的尊嚴

佛教僧侶趕經懺法會，以此賺錢搏聲名，是從明末清初以來就一直墮落到民國初期的一種現象。師父在上海時期（1949年前後）趕經懺的痛苦經驗，讓他懷疑原本從小所相信的東西，到底有什麼未來出路可言？這是關於信仰的尊嚴。

（二）國家民族的尊嚴

國共內戰後，師父離開大陸，抵達臺灣。如果各位去看師父的《歸程》一書，裡頭講得很清楚，在那一個戰亂的當下，他親眼看到同船逃難的人，是如何的尊嚴掃地。那是讓人痛心疾首的尊嚴淪喪，既是人格尊嚴的淪喪，也意味著是整個國家民族尊嚴的淪喪。

（三）批判的尊嚴

從1950年代，師父在醒世將軍的這一個時期到1960年代美濃閉關，一直希望能夠去提振信仰的尊嚴。他藉用很多的知識和文化資源，包括胡適的言論等來進行批判，但是，批判的

力量在現實條件底下又能走多久呢？其實這一點特別令我觸動，因為我跟我身邊的朋友們從八〇年代末就以批判為職志，到處批判這個不對、那個不對，應該這樣、如何如何……。即便現在我那些朋友們有的進入政黨，位居高位，甚至變成是執政黨了，依然在批判。所以就變成一個現象，就是執政黨在批判，在野黨反而不批判了，這倒是滿特別的。但是到底批判是什麼呢？批判是不是可以作為一個生命的本質或本能，或者甚至是信仰可以去依靠的東西呢？其實師父在這個過程裡面，就碰到了這個問題：如果你要去維護一個信仰的尊嚴，你要做的可能不是只有批判，你還有別的事情要做。所以印順法師與南亭長老都跟他講，批判不是唯一的，重要的是「自己要站起來」。

（四）名利的尊嚴

之後是師父東渡日本留學的過程：東初老人跟他講宗教家與宗教學者的區別、伴鐵牛禪師的棒喝，回到臺灣參加國建會感受到人情冷暖，到最後博士學位這麼難得都拿到了。第一個中國（或者華人）的僧侶在國外拿到正式博士學位，可是他回不了自己的家。名利意味著什麼？這是名利的尊嚴。

二、聖嚴法師的放下

還有一點是我在一些材料上面看到過，但是影片裡面沒有呈現。就是美國佛教會邀請聖嚴法師去紐約大覺寺擔任住持的時候，他們其實事先開過會，說要像英國鍛鍊王子那樣的來迎接和鍛鍊聖嚴法師。也就是即便是英國的王子，他們到軍艦上服役，一樣要去刷馬桶、去洗廚房、要去做各種跟小兵一樣的

工作。當時我們連英國查理王子（還是哈利王子）在軍艦上刷馬桶的影像都已經找到，只不過後來沒有把它剪進影片。

這件事也是令我非常觸動，因為老實說大部分的人（如果我能夠代表大部分的一般臺灣民眾的話），我們對於出家人、對於真正在正信的道路上發心修行的出家人，其實認識是很有有限的。我是一直到做這一個片子，看到師父的故事，認識了許多法師之後，我才覺得這一種人生過得真的很不一樣。這跟我們這些在外面被名利、學歷、各種尊嚴所追趕的一般人的想像是不一樣的。所以在影片裡面，大家可以看到師父學習到的各種放下：來自靈源老和尚、來自東初老人、來自印順長老、來自伴鐵牛禪師，乃至來自弟子們，以及到最後來自命運的，關於病痛與死亡的放下過程。

三、聖嚴法師的提起—究竟尊嚴

我的認知是，有了放下的過程，才能夠提起；提起什麼？提起的是究竟尊嚴。所謂的究竟尊嚴，就像師父自己說的這一段話，非常有代表性：

「生命需要有個大方向，來作為自己永恆的歸宿。佛教徒是要將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分享給他人，把所有功德迴向給一切眾生；同時要不斷發願，願能夠自我成長與自我消融，以圓融與超越的態度，做永無止盡的奉獻。如果建立了這樣的目標，不論人生是長是短，都是極有尊嚴的。」（出處：《平安的人間》）。

影片中，我在師父與沈家禎居士會面段落的結尾處用了這段話。我希望在這裡透露一個訊息，就是不管師父的喜怒哀樂

是什麼樣，他的情緒、經歷是怎麼樣，他的信仰其實提供了另外一個觀照，在觀照著自己的逆增上緣或者是順緣。

另一個非常啟發我的是師父跟龍應台女士的對話中，一開始就提到了法鼓山與一般公益團體或社會團體的做法不同：

「與一般公益團體的做法不同，我們提供的是永恆的關懷。一般的社會服務、社會運動，多半給予現實上的關懷，而我們重視的是，從現實生活到永恆的生命，都需要關懷。」（語出：《永恆的關懷—聖嚴法師與龍應台對話》）

所以關於永恆的生命這件事情，是可以用來觀照現實的生活，或者甚至成為所謂現實的尊嚴的一個超越性支點。在閱讀這些材料的過程中，我覺得包括師父的這些語言文字，或是佛教典籍，已經提供了我們對於永恆生命的認識。從這裡再去印照現實的生活裡面的一些糾葛，然後在超越性想象空間的層面上進行運作。因此讓我們能夠有一些說是解脫也好，或是另外一個層次的思考，而不是糾結在現實、現世尊嚴的層次上。因此，師父才會這樣說：

「生命若無尊嚴，何喜之有？死亡若有尊嚴，又何必悲哀？」（語出：《平安的人間》）

這也是對於尊嚴這個詞，師父所提出的很究竟的思考。

四、生命的尊嚴、信仰的尊嚴、漢傳佛教的尊嚴

老實說在思考尊嚴這件事情、或是出家人（或修行人）的尊嚴這件事時，一般社會大眾很容易局限在對於出家人的某一種刻板印象。甚至是不正確的印象，比方說一些流傳已久的形象，像是《西遊記》裡面的唐三藏，一副唯唯諾諾的樣子。對

比之下，孫悟空才是最厲害的；或者是酒肉和尚魯智深，諸如此類的章回小說中的人物設定；又或者出家人好像就是經常在路邊托鉢要飯的苦行僧。

但是當我們真的能夠去接觸到正信的信仰、接觸到出家人之後，我們才知道他們對於一些外在的、表象的，這一些構成社會主流價值尊嚴的東西，包括形象、名利、學歷，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在意。他們真正在意的就是生命、信仰的尊嚴，還有對師父而言，漢傳佛教的尊嚴。

伍、我的放下與提起

以上關於生命、信仰、還有漢傳佛教的尊嚴，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因為我做這個影片的時候，其實並不只是試圖去傳達這些訊息，而是我會把這個過程看成是我自己的修行，或自我鍛鍊與自我發現。

一、放下紀錄片工作的攀緣心

如果在這個影片裡面有一些關於我的提起或放下，第一個就是我覺得我開始懂得什麼叫做攀緣心，以及找到一些方法去放下一些攀緣心。

這個攀緣心可能是什麼呢？因為紀錄片工作在過去都是主張創作自由、犧牲精神、要有批判性、希望能夠得獎和有很好的票房等等。還有，紀錄片是在提升人文精神、給社會帶來進步諸如此類的東西，我們在做紀錄片的時候會不斷的將這些價

值放在自己身上，覺得自己有尊嚴。因為這些價值，所以你可以任勞任怨、可以花很多的時間用很少的錢，然後想辦法做出一個影片出來。但是現實是什麼呢？現實是這個影片可能很多人看不到。

我在做《本來面目》之前，其實已經意識到這是紀錄片一個很大的危機。我們一方面想要用我們自己一顆真誠的心，去發掘一些題材，去提醒這個社會應該注意這個事情、那個事情。希望能夠讓這個社會有所進步或有所改變，或者至少我們知道這個社會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可是，事實上在整個華人社會裡面，紀錄片的傳播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二、放下不等於放棄

我經常問一些要做紀錄片的年輕人，為什麼要做紀錄片？花了這麼多時間，兩年、三年、四年、五年，而得到的錢這麼少，可能還不一定養得起小孩。做了片子以後，也就那麼幾百個、幾千個、幾萬個觀眾在看，到底為什麼要做紀錄片？我當然並不是說做紀錄片一定要能夠達到億萬的票房什麼的，我的意思是我們要回過頭來思考我們為什麼要做紀錄片？

假設我是為了要對這個社會產生影響力的話，那其實劇情片也是一個選擇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大陸去年（編按：2018）有一部賣座很好的電影叫做《我不是藥神》，它其實就是一個具備中國特色的批判性現實主義電影，票房有幾十億。它是在談藥品的問題、談公益，我那時候看完冷汗直流。我想這如果換成是紀錄片的話，大概只有幾萬人看吧，不會像這樣影響到更多的觀眾，甚至可以影響一代人。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要繼續做紀錄片工作，是為了什

麼？是為了我的創作自由嗎？覺得自我犧牲是特別高尚的嗎？我的批判精神很值得被關注推崇嗎？就是要去得獎嗎？其實我碰到好多年輕的紀錄片工作者一心就只想得獎。在大陸特別的多，或者是希望能夠趕快上個院線，能在履歷上多一筆上院線的紀錄。做紀錄片只是為了這些嗎？還是有些別的可能性？

事實上，透過這個影片的過程，我意識到我們應該都要放下這些。放下不意味著放棄，因為這些可能都是路徑，就好像佛教經典《金剛經》所說：「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它只是一個過程、一個道路、一個過河的竹筏，從此岸到彼岸的一個工具。工具是需要的，但最後都應該被放下。

但是，關鍵是那個彼岸到底是什麼？其實沒有人問。現實上，絕大部分都是摸著石頭，不過河。

三、提起紀錄片工作的究竟尊嚴

我自己從做這個影片的過程得到了一個初步的體會，就是我覺得紀錄片究竟的尊嚴，其基礎在於一個紀錄片工作者如何找到自己與影片題材的內在相應，然後以慈悲心來與大眾分享這個內在相應。

因此，這個內在相應跟慈悲心是關鍵。如果你真的能夠內觀、能夠去映照到自己，去感受到自己內在的狀態跟這個影片主題人物的關係。然後，把它投射到這個作品裡頭，觀眾會感受到的。其實我經常說師父的故事不一定需要我來講，很多人都在講。以各種方式的講，做影片也是一樣，同一個題材很多人都會做。但是對我而言，要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是要在這個故事裡面注入一點什麼，這個注入的意思就是我之前在一個紀

錄片討論會中提到，是要掏心掏肺的。掏心掏肺的意思並不是說你一定要把自己搞得非常的辛苦，而是前面我所提到，怎麼樣找到你跟這個作品內在的相應，讓觀眾可以感受到。如果找到了內在相應，這個影片自然就有它的獨特性格，同時也具備傳播的力度。它可以不需要靠票房，靠政策的扶持，不需要因為得獎，就可能可以走得很遠、很久、很廣。

陸、結語

這個心得是我從《冲天》的經驗來的。《冲天》那個片子我也是用同樣的方式、心情掏心掏肺的在做，到今天它一直還在傳播，在中國大陸也是。所以我最後要講的是，在做這個影片之前，我其實對紀錄片工作有很大的危機感。但是通過《本來面目》這個影片的經驗，我意識到不管我自己做紀錄片，還是我幫別的導演（我經常還要做監製、製片去幫別的導演），我都會用上這一套方法。這套方法，其實很多是源自於佛法，而不是來自西方的紀錄片教科書。

如果今天我們要在華人社會的現狀底下，繼續做這樣的工作。我們必須要有越來越多這樣的工作者，來進行文化創意、影片創作也好，從根本上對這個社會產生。不能說是改革，而是「潤物細無聲」的影響。我覺得我接下來的工作，就是盡量的把我這些體會分享給更多在這一條路上的工作者。雖然我還是認為可能在我有生之年，紀錄片並沒有辦法真的對於整個社會起什麼很大的作用一說白了起到最大作用的還是好萊塢電影。但是就如同虛雲老和尚所說的那兩句話：「空花佛事，時

時要做；水月道場，處處要建。」以前我想到這兩句話的時候就會覺得很無力、很悲情，甚至灰心氣餒；但是我現在覺得，在此時此地此生，紀錄片工作的當下本質，它的本來面目，其實就是這樣子。

我就先講到這裡，謝謝大家。